

學人往事

無畏地激進，激進地無畏 ——懷念德里克

● 柯瑞佳 (Rebecca E. Karl)

著名中國近代史教授德里克 (Arif Dirlik, 1940-2017) 因肺癌逝世，享年七十七歲。1940年11月23日，德里克出生於土耳其的梅爾辛 (Mersin)，並於2017年12月1日在美國俄勒岡州尤金 (Eugene) 去世。他在伊斯坦布爾的羅伯特學院 (Robert College) 就讀本科，主修電子工程。畢業後，他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 (Fulbright Fellowship) 前往美國紐約州北部的羅切斯特大學 (Rochester University) 當研究生，最初修讀理工科。此時正值1960年代中期，中國爆發了世界上最複雜的革命運動之一——文化大革命，並在全世界引發共鳴。從土耳其的學生時代開始，德里克就是一名政治激進份子。此時作為一種思考革命和激進主義的可能方式，中國深深地吸引了他。為了更好地探索非西方歷史背景下現代革命的意義，他把研究方向從科學轉向了中國歷史——仍由富布賴特獎學金資助！

在羅切斯特，德里克幸運地遇到了幾位才華橫溢的年輕教授，他們剛剛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無產階級的背景使他們對反傳統觀點持非常開放的態度。這些人包括現代日本史專家哈若圖寧 (Harry D. Harootunian)，那時他剛開始準備寫第一部著作《走向維新：德川日本政治意識的崛起》(*Toward Restoration: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okugawa Japan*, 1970〔譯者按：這是研究明治維新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哈若圖寧是亞美尼亞裔美國人，家人在底特律的汽車廠工作。他發現來自土耳其農村的青年德里克是一個聰慧的人、一位激進的政治夥伴和一名值得栽培的學生。我一直想像那樣一個場景：1960年代末，哈若圖寧和德里克在紐約上州喝着烈酒，智慧交鋒，他倆之間產生的友誼彌合了世界史上最血腥、至今依然不被土耳其政府承認的重大分歧——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他倆幾十年的友誼和在精神層面的同志關係，為我們這樣的後來者創造了許多邂逅的空間。

由於當時美國大學生不准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德里克前赴台灣和香港學習中文，並開始準備博士論文研究。在那裏，他遇到了來自其他美國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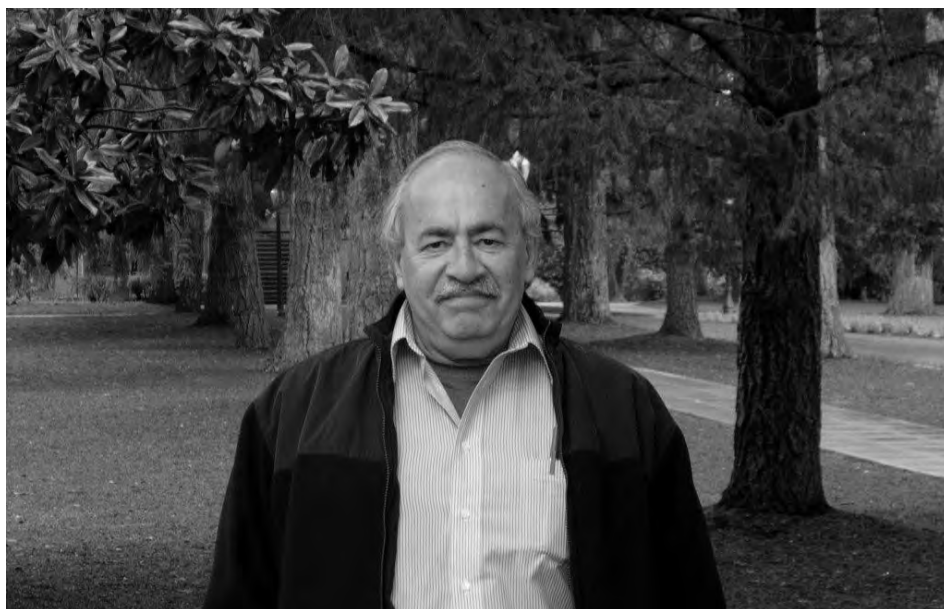
的精英和接受常規培訓的學生，其中許多人有傳教士或中央情報局(CIA)的背景，他們大多對德里克的政治及家庭出身極為懷疑。隨後，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圖書館展開研究，該圖書館藏有豐富的中國歷史資料。德里克很喜歡講一個故事：1972或1973年在伯克利，他曾試圖參加一個有關革命和公民權利的黑人激進集會，卻被告知白人是不允許參加。德里克說：「我是土耳其人，不是白人。」結果他獲准參加。

德里克的第一部著作《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1978)挑戰了當時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這本書仔細考察了1930年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辯論——主要是社會史論戰，以及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通過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思考中國歷史的嘗試。德里克認真思考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Maoism)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開始全面降溫的時候。當時美國許多研究中國的左派學者開始收回他們之前的政治承諾，而德里克依然拒絕否定自己的激進主義，因為他所持的是一種政見，而不僅僅是為了跟隨流行的立場……當時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新方向是反激進主義以及將政治抽離學術，因此德里克在該領域的核心圈子不受重視。

德里克後來的幾本著作，包括《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1989)、《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91)，以及與老朋友兼盟友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合編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驗：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幾個議題》(*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1989)，可以看作



1983年12月19日，德里克(第一排左四)等在南京大學校門合影。(資料圖片)



德里克(資料圖片)

是對其第一部著作邏輯的延伸：中國對激進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何意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和激進主義對中國意味着甚麼？德里克對這些基本歷史問題的思考強度和深度，是大部分學者沒有達到甚至沒有意識到的。

1989年，更準確地說是1989年秋，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為德里克舉辦的一個晚宴上我遇到了他。我是由一個朋友帶去的，他認為我會很高興見到這位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教授。我當時患有喉炎，勉強可以用嘶啞的聲音說話。但不知何故，德里克挺重視我，當晚在我低啞的嗓音和不斷要求乾掉更多白酒的聲音中，我們進行了深入的交談。對我來說，我此後的研究一直在和德里克對話。

在我遇見德里克的時候，他剛剛出版了《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而《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還只是書稿。在首次共晉晚餐之後的一次會面中，他把《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一書和《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書稿交给了我，請我在下一次會面時給出評論。這個任務把我嚇壞了，我也對他如此屈尊感到困惑。現在的我完全想不起來當時就這兩本書曾對他說過些甚麼，但是我確實用了很長時間讀這兩本書，並決定要跟隨他學習。

從1990到1995年，德里克是我在杜克大學的博士生導師。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導師，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教會了我如何在研究、教學和行政工作中無畏地激進、激進地無畏。許多人知道，德里克有時並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他知道如何羞辱他人並容易懷恨在心。但他也是一名嚴肅的思想家和學者，並且堅定地致力於可能的激進主張。因此我們大可以原諒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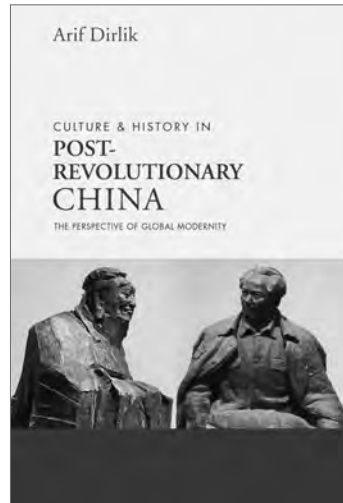
德里克著作等身，誰能忘記他介入後殖民主義的辯論？以及其有關後現代主義、第三世界主義、亞裔美國主義和環太平洋研究等議題的討論？他的

許多討論在全球範圍內的知識界和政治領域都是極其重要的，大部分經過翻譯（包括中文）被廣泛閱讀。我不會說德里克的著作具有影響力，因為我知道他討厭「影響力」這個詞；他從未停止提醒我們：「影響力」是一個占星術的概念，而不是歷史概念。

德里克的學術產量驚人，工作能力出類拔萃；他如飢似渴地閱讀，閱讀面覆蓋多個學科；他寫作既快速又堅定，沒有一句廢話或派不上用場的想法；他在大大小小各種平台不斷出版，當互聯網變得普及，他也開始在網上發表文章。此外，他總是有時間對其他人的工作進行透徹的點評；參與學生培訓以及閱讀他們的論文；到世界各地參加會議和進行教學；喝酒、抽煙、吃飯、烹飪以及娛樂，給人一種整天無所事事、談天說地的假象。他是俄勒岡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 歷史系教授蒲樂安 (Roxann Prazniak) 的人生伴侶，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2001年，德里克離開杜克大學，在俄勒岡大學獲得教職。他喜歡俄勒岡州大片的戶外天地，有遼遠的天空、美麗的大自然、清澈的空氣和數英里空曠的公路。俄勒岡州完全適合他。儘管對美國嚴重的局限有清醒的認識，他始終對這個國家心懷希望；儘管對共產黨及其當代轉型發出過嚴厲批評，他從未掩飾對中國的憧憬。德里克從未被權力或獲得財富的前景所蒙蔽，他會質疑那些被蒙蔽的人。直到最後，他仍然堅持一種激進主義可能性的願景，這個願景是與馬克思主義對世界及近代史的分析方法聯繫在一起的，而不是與任何一個政黨或政體聯繫在一起。

我會懷念德里克，他以難能可貴的政治堅定、誠實和智慧真正地活過。他熱愛生活，熱愛朋友和學生。雖然他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但最終還是在自己更關心的許多其他領域獲得了承認。他總是一個異數，也應該如此。



Arif Dirlik, *Culture & His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rif Dirlik, Guannan Li, and Hsiao-pei Yen, eds.,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張緣 譯 葉敏磊 校